

“人地分离”与“资源重组”： 易地扶贫搬迁后耕地撂荒与产业帮扶模式研究

雷馨圆¹, 张祎彤¹, 仇焕广¹, 杨晓婷²

(1.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2.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推动多元产业发展是破解易地扶贫搬迁“人地分离”后耕地撂荒难题、促进迁出村一地一业“资源重组”的关键途径, 但当前较少研究关注迁出村的耕地利用和产业发展问题。基于此, 在廓清研究对象为具备生产功能的迁出村的基础上, 从理论层面构建了一人一地一业关系的理论框架, 并从“人地分离”程度与“资源重组”程度两个维度归纳出搬迁户自行种植、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和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三种产业帮扶模式。基于中西部地区8省区846份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数据, 利用OLS回归分析了搬迁距离对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 并讨论产业帮扶模式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面临的“人地分离”问题加剧了耕地撂荒行为, 参与产业帮扶能显著减少耕地撂荒行为; 产业帮扶能缓解搬迁距离对撂荒行为的影响, 且不同产业帮扶模式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进一步结合典型案例资料, 深入剖析了三种产业帮扶模式的运行机制、适用条件和优劣势, 为迁出村因地制宜选择产业帮扶模式的实践应用提供依据。并从迁出村资源盘活、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产业帮扶模式选择三个方面, 为推动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 “人地分离”; “资源重组”; 产业帮扶; 耕地撂荒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关涉搬迁户的迁出和安置问题, 还关涉搬迁户的生计空间和生计策略问题。截至2020年底,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推动近1000万人口实现了“搬得出”(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106/t20210630_1285081.html?code=&state=123), 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1], 但“移房不移地”的搬迁方式导致了“人地分离”现象^[2], 重塑了迁出村人地关系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阶段, 如何保证搬迁户“稳得住”“能致富”是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重点。具体来说, 搬迁户是否“稳得住”不仅与安置区产业发展、就业带动的“吸力”相关, 还与迁出村耕地利用的“拉力”等多方面因素相关。与之对应, 搬迁户是否“能致富”不仅与新增的非农就业机会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相关, 还与迁出村的耕地带来的经营性收入或财产性收入相关。为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两条底线, 易地扶

收稿日期: 2023-08-07; 修订日期: 2023-10-2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141307, 72303014);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30175);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23年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23A03)

作者简介: 雷馨圆(1998-), 女, 福建福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粮食安全、产业发展等研究。

E-mail: leixinyuan1998@126.com

通讯作者: 杨晓婷(1994-), 女, 天津人, 博士, 主要从事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与数字经济等研究。

E-mail: xtyang@btbu.edu.cn

贫搬迁“人地分离”后迁出村耕地撂荒问题如何解决应引起关注。

近年来，政府相继出台了推动产业发展与迁出村耕地利用的相关指导意见。2022年9月，国家乡村振兴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指导意见》中强调“继续加大产业帮扶力度，持续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帮扶成效”。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023年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切实保障搬迁群众在迁出地原有合法耕地”“鼓励支持各地在迁出区开展土地规模经营”“盘活迁出地土地资源，不断拓宽搬迁群众增收渠道”。这表明国家政策也对迁出村^①耕地撂荒和产业发展问题开始关注。调研数据显示，有61.23%的搬迁户存在“两头跑”种植耕地的现象^②，这既印证大部分迁出村的耕地具有一定的生产功能，又侧面说明“人地分离”增加了耕地利用成本、阻碍搬迁户对耕地的有效利用。因此，本文关注于耕地具有生产潜力、值得被利用的迁出村的“人地分离”问题。

已有文献针对脱贫地区的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目前，脱贫地区仍然面临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可持续性不强等制约因素^[3]，未来应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其他社会主体的作用^[4]，加强产业链建设，提高产业抗风险能力^[5]。但现有关于产业帮扶的文献鲜有考虑易地扶贫搬迁的特殊情景^[6,7]，即使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后产业帮扶的文献，也更多聚焦安置区的产业发展以及带动方式^[8,9]，忽视了“人地分离”背景下迁出村的产业发展问题。而人—地—业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10]。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易地扶贫搬迁如何重塑迁出村人—地—业的耦合关系？第二，易地扶贫搬迁后“人地分离”、产业帮扶对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如何？第三，易地扶贫搬迁后有哪些适合迁出村耕地利用的产业帮扶模式，这些模式如何破解“人地分离”带来的耕地低效利用的问题并实现“资源重组”？对此，本文基于人—地—业关系的理论框架，结合一手调研数据和案例资料，通过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探讨不同产业帮扶模式下“人”如何参与、“地”如何利用、“业”如何发展。这不仅有利于破解“人地分离”问题，促进迁出村耕地的有效利用，实现人—地—业“资源重组”，而且有利于拓宽搬迁户的收入渠道，为进一步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参考。

1 人—地—业关系的理论框架构建

1.1 人—地—业关系的理论框架

“劳动力”“耕地”“产业”在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中呈现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受制于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要素不匹配、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完善等问题，贫困地区往往会陷入“基础条件差—贫困—产业无法发展—进一步贫

① 相关文件中，也称迁出地、迁出区等表述，本文统一以迁出村为代表。

② 依据《农业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本文讨论的是搬迁户安置后仍为农业户口且对迁出村耕地仍有承包权的情况。

困”的恶性循环，人—地—业关系陷入耦合失调困境^[11,12]，导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而现有研究多将人—地—业理论框架应用于乡村遗产地、乡村生态、国土空间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13-15]，鲜有研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的特殊情景，并以“迁出村”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和案例分析。由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外部政策冲击，迁出村人—地—业关系显著重构（图1）。“人—地”之间分离的现象导致迁出村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耦合失衡。对此，“业”作为连接主体性要素“人”和客体性要素“地”的桥梁，不仅能够促进耕地的功能发挥，还能够带动小农实现多元增收，促进人—地—业耦合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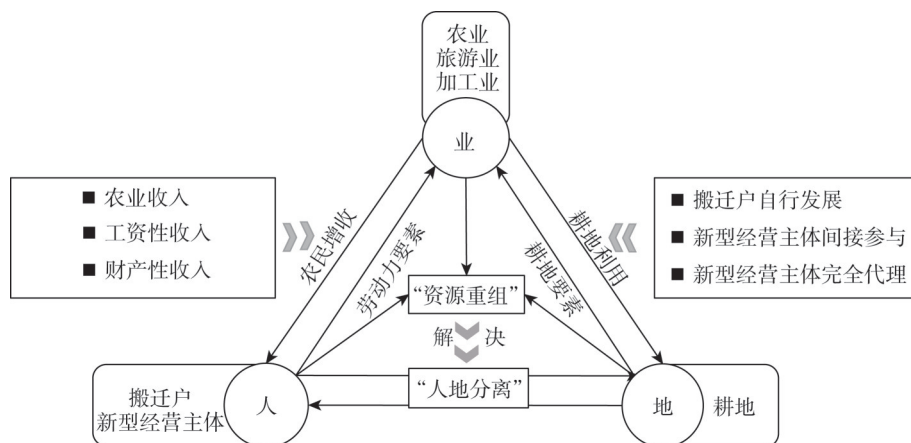


图1 易地扶贫搬迁后迁出村人—地—业关系的理论框架

Fig. 1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armer-cropland-industry relationship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1.1.1 人—地关系:搬迁户与耕地的空间分离

易地扶贫搬迁重建了搬迁户的生计空间。据8省区（湖北、湖南、甘肃、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调研数据统计，搬迁户与耕地之间的距离从搬迁前的2.9 km增加到搬迁后的21.1 km。这导致易地扶贫搬迁户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生计结构发生转变，搬迁户群体内部的生计策略也产生分化^[16]。其中，以非农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后，农业生产机会成本提高，进而导致迁出村耕地低效利用甚至闲置撂荒。例如，调研中有农户表示“原来我家主要在镇里打零工，农忙回来照看下地；现在（搬迁后）离地（迁出村耕地）更远了，就懒得回去，坐车要2小时还费钱，地里就随便种点，有些地就荒着。”而部分搬迁户难以迅速适应非农就业的结构性转型，农业生产仍是其重要的过渡性生计策略。尤其在大部分安置地区采取了“无土”非农化安置方式的情况下，部分搬迁农户出现频繁“两头跑”甚至回流的现象^[17]。据8省区调研数据统计，61.23%的搬迁户仍会返回迁出村从事农业生产，甚至有部分农户为了农业生产而长期在旧家居住，这不利于实现搬迁户“稳得住”的目标。

1.1.2 地—业关系:产业促进耕地的功能发挥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后，后续产业帮扶政策的实施有助于迁出村实现产业发展，促进耕地多功能的有效发挥。由于搬迁后“人地分离”的客观原因，迁出村耕地利用中用于小农户日常生活消费的部分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政策向脱贫地区的倾斜，为迁出村实现耕地规模化、农业产业化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可能。具体来

说，一方面，政府可通过组织农户种植、增强新型经营主体带动等产业帮扶方式引导搬迁户生产特色农产品，或通过土地流转将搬迁户低效、闲置的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使其发挥更高水平的生产功能，提高迁出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将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嵌入旅游业，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促进迁出村耕地的多功能实现。

1.1.3 人一业关系：产业带动小农的多元增收

易地扶贫搬迁后，村庄人一业关系涉及到两类群体，一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能人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二是作为普通劳动力的易地扶贫搬迁户。“人地分离”的背景下新型经营主体为迁出村实现规模化经营提供更多可能，其通过资源整合、资本注入以实现农业专业化生产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搬迁户可以作为劳动力直接参与产业发展，或通过获得收益分红间接参与产业发展，拓展增收渠道。例如，在可发展的迁出村进行产业发展，搬得近的农户不仅可以直接参加产业发展获得农业经营性收入，而且可以作为员工获得工资性收入，还可以通过土地、农机等要素入股获得财产性收入；搬得远的农户则通过土地流转、入股等多种形式间接参与产业发展，享受土地资源带来的财产性收入。由此可见，“产业”作为连接“人地关系”的桥梁，可以形成不同的产业帮扶模式，促进人一地一业关系的耦合协调，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后迁出村的“资源重组”。

1.2 基于人一地一业关系理论框架的三种产业帮扶模式

基于人一地一业关系理论框架及调研中地方实践的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迁出村产业帮扶模式主要包括三种（图2）。其一，搬迁户自行种植，政府等相关部门提供技术培训、种苗等服务促进搬迁户参与产业发展，搬迁户对产前、产中、产后进行自主决策。其二，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搬迁户直接对迁出村耕地进行种植，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辅助服务。其三，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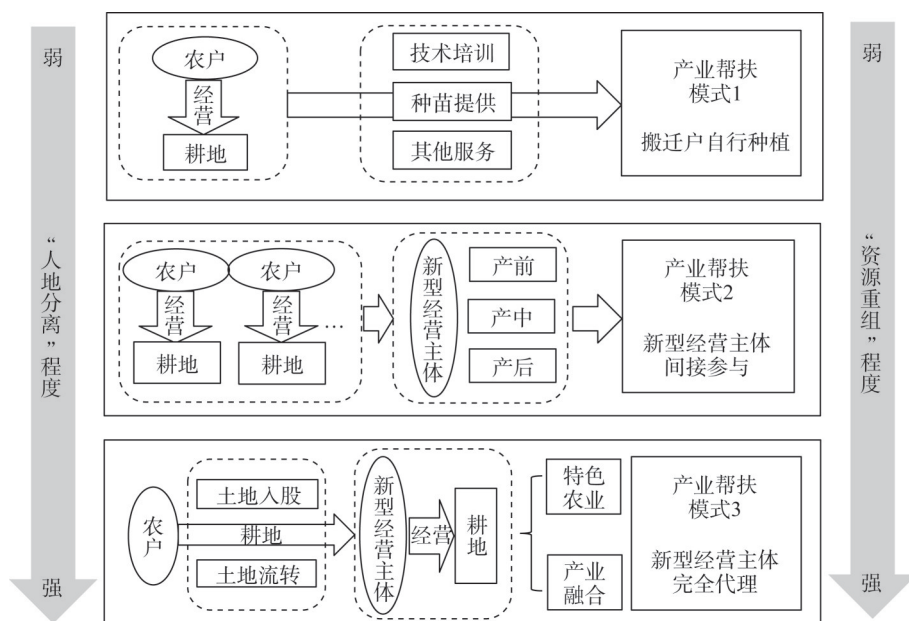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人一地一业关系理论框架的三种产业帮扶模式

Fig. 2 Three industrial support mod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armer-cropland-industry relationship

流转、土地入股等方式整合搬迁户耕地,实现规模化经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或将农业嵌入旅游业实现产业融合发展。这三种迁出村产业帮扶模式呈现出“人地分离”程度越强、“资源重组”程度越高的规律。与此同时,因地制宜、合理适配的产业帮扶模式能够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发挥耕地的多功能性,拓宽搬迁户的收入渠道。对此,本文首先使用实证分析,讨论“人地分离”背景下产业帮扶对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具体案例资料,深入剖析三种产业帮扶模式的运行机制、适用条件及优劣势,为迁出村后续扶持工作提供可循经验。

2 “人地分离”背景下产业帮扶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2.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2016年、2017年、2019年、2021年四期追踪调研数据,该调研涉及湖北、湖南、甘肃、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8省(自治区)。课题组选取了包括武陵山片区、六盘山片区、秦巴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片区五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及一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共计16个样本县作为研究范围,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并进行了深度调研访谈。脱贫户样本的选取采用了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具体的抽样步骤如下:首先,于每个样本县内随机选择2~3个乡镇。其次,在所选取的每个乡镇中,随机选择3个行政村。接着,对于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1~2个村民小组。最后,从每个村民小组中随机抽取8户脱贫户作为研究样本。调研详细地收集了搬迁户的家庭成员基本特征、农业生产、产业帮扶、就业情况等家庭信息。其中,产业帮扶包括搬迁户自行种植产业帮扶模式(模式1)、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产业帮扶模式(模式2)、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的产业帮扶模式(模式3)三种模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旨在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后“人地分离”对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因此仅选取2021年全部完成搬迁的样本展开实证分析,最终获得有效样本846个。

2.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1)被解释变量(表1)。撂荒面积通过“当年撂荒的耕地面积为多少(亩)”进行测度,为连续变量。是否撂荒通过是否有撂荒的耕地面积进行测量,为二分类虚拟变量,存在撂荒的耕地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撂荒比例通过“当年撂荒的耕地面积为多少(亩)/承包的耕地面积为多少(亩)”度量。样本中约23.0%的搬迁户存在撂荒现象,平均撂荒面积为1.42亩,占总承包地的比例为14.2%。

(2)核心解释变量(表1)。搬迁距离使用“搬迁后安置点与原有耕地的距离”衡量,搬迁后安置区与迁出村耕地的平均距离为21.1 km。是否参加产业帮扶分为搬迁户自行种植产业帮扶模式(产业帮扶模式1)、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产业帮扶模式(产业帮扶模式2)、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的产业帮扶模式(产业帮扶模式3)三种模式,若参与其中一项取1,否则取0。样本中32%的搬迁户参加产业帮扶,其中4%的搬迁户参加“搬迁户自行种植”的产业帮扶模式,9%的搬迁户参加“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的产业帮扶模式,19%的搬迁户参加“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的产业帮扶模式。

(3)控制变量(表1)。为了精确估计搬迁距离对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本文添加了

表1 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描述		样本量/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撂荒, 1=是, 0=否	846	0.23	0.42	0	1.00
	撂荒面积/亩 (1 亩≈667 m ²)	846	1.42	3.90	0	25.00
	撂荒比例	846	0.14	0.30	0	1.00
核心解释变量	搬迁距离/10 km	846	2.11	3.58	0	20.00
	是否参加产业帮扶, 1=是, 0=否	846	0.32	0.47	0	1.00
	搬迁户自行种植产业帮扶模式 (模式1), 1=是, 0=否	846	0.04	0.20	0	1.00
	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产业帮扶模式 (模式2), 1=是, 0=否	846	0.09	0.29	0	1.00
	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的产业帮扶模式 (模式3), 1=是, 0=否	846	0.19	0.39	0	1.00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岁	846	56.39	8.97	32.00	87.00
	家庭平均教育年限/年	846	5.28	1.76	0	10.50
	老年人占比	846	0.14	0.25	0	1.00
	劳动力占比	846	0.77	0.29	0	1.00

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劳动力占比、家庭老年人占比、家庭平均教育年限以及户主年龄。

2.3 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选用OLS方法识别搬迁距离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y_i = \beta_0 + \beta_1 distance_i + \beta_2 ind_i + \lambda X_i + \varepsilon_i \tag{1}$$

$$y_i = \beta_0 + \beta_1 distance_i + \beta_2 ind_{1i} + \beta_3 ind_{2i} + \beta_4 ind_{3i} + \lambda X_i + \varepsilon_i \tag{2}$$

式中： i 代表易地扶贫搬迁户； y_i 代表被解释变量，即第 i 户的耕地撂荒行为，包括是否撂荒、撂荒面积和撂荒比例； β_0 为常数项； $\beta_1 \sim \beta_4$ 为待估参数； $distance_i$ 是核心解释变量搬迁距离，如果 β_1 显著大于0代表搬迁距离越高，农户出现撂荒行为的可能性越高； ind_i 表示是否参加产业帮扶， β_2 显著小于0则代表参加产业帮扶可以显著减少撂荒行为； ind_{1i} 、 ind_{2i} 、 ind_{3i} 分别表示农户是否参加产业帮扶模式1、是否参加产业帮扶模式2、是否参加产业帮扶模式3； X_i 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劳动力占比、老年人占比、家庭平均教育年限、户主年龄及县级固定效应； λ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 ε_i 为随机误差项。

为进一步分析产业帮扶政策是否能够缓解搬迁距离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本文在式（1）、式（2）的基础上增加了搬迁距离和产业帮扶的交互项展开分析，如式（3）、式（4）所示，变量设定与式（1）、式（2）式相同。式（3）中的 β_3 可以用于判断搬迁距离和产业帮扶之间的交互效应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若 β_3 为负向显著，产业帮扶能够缓解农户的撂荒行为；若 β_3 为正向显著，说明产业帮扶会加剧农户的撂荒行为；若 β_3 不

显著，则说明搬迁距离和产业扶贫政策的交互效应对农户撂荒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式（4）中的 β_5 、 β_6 、 β_7 代表了对应的产业帮扶模式是否在搬迁距离影响撂荒行为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

$$y_i = \beta_0 + \beta_1 distance_i + \beta_2 ind_i + \beta_3 distance_i \times ind_i + \lambda X_i + \varepsilon_i$$

(3)

$$y_i = \beta_0 + \beta_1 distance_i + \beta_2 ind_{1i} + \beta_3 ind_{2i} + \beta_4 ind_{3i} + \beta_5 ind_{1i} \times distance_i + \beta_6 ind_{2i} \times distance_i + \beta_7 ind_{3i} \times distance_i + \lambda X_i + \varepsilon_i$$

(4)

2.4 估计结果分析

表2汇报了搬迁距离、产业帮扶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搬迁距离以及产业帮扶对撂荒行为的影响系数均显著，说明搬迁距离显著增加农户的耕地撂荒行为、参加产业帮扶能够显著减少撂荒行为^③。虽然易地扶贫搬迁后搬迁距离对撂荒的概率影响不显著，但对撂荒面积及撂荒比例都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具体而言，搬迁距离对撂荒面积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搬迁距离每增加10 km会导致撂荒面积增加0.102亩，相当于平均撂荒面积（1.42亩）的7.18%。搬迁距离对撂荒比例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搬迁距离每增加10 km会导致撂荒比例提高1%。总的来说，易地扶贫搬迁后“人地分离”问题，导致耕地撂荒行为出现的概率提高，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迁出村耕地的低效利用。（1）~（3）列的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产业帮扶显著降低8.3%的撂荒概率、减少了0.615亩的撂荒面积、7.1%的撂荒比例。（4）~（6）列进一步

表2 “人地分离”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

Table 2 The impact of "separation of farmers and cropland" on cropland abandonment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是否撂荒	撂荒面积	撂荒比例	是否撂荒	撂荒面积	撂荒比例
搬迁距离	0.006 (0.005)	0.102** (0.046)	0.010*** (0.003)	0.006 (0.005)	0.103** (0.046)	0.010*** (0.003)
产业帮扶	-0.083*** (0.032)	-0.615** (0.288)	-0.071*** (0.022)	— —	— —	— —
产业帮扶模式1	— —	— —	— —	-0.045 (0.070)	0.224 (0.631)	-0.038 (0.048)
产业帮扶模式2	— —	— —	— —	-0.077 (0.051)	-0.300 (0.465)	-0.063* (0.036)
产业帮扶模式3	— —	— —	— —	-0.095** (0.039)	-0.990*** (0.353)	-0.084*** (0.0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232* (0.124)	0.294 (1.128)	0.040 (0.086)	0.231* (0.124)	0.272 (1.127)	0.039 (0.086)
观测值数量/户	846	846	846	846	846	846
R ²	0.144	0.178	0.192	0.145	0.182	0.192

注：***、**、*分别表示0.01、0.05、0.1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下同。

③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对每个模型自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检验，VIF的均值为2.7左右，均远小于1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分析了三种产业帮扶模式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发现参加产业帮扶模式3相对于未参加产业帮扶的农户，能够显著减少撂荒行为。

进一步考虑“人地分离”背景下三种产业帮扶模式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由表3第(1)列、第(2)列、第(3)列可知，产业帮扶和搬迁距离的交互项对衡量撂荒行为的三个被解释变量（是否撂荒、撂荒面积、撂荒比例）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产业帮扶政策有效地抑制了搬迁后距离导致的撂荒行为，是破解搬迁后迁出村耕地低效利用的重要渠道。第(4)列、第(5)列、第(6)列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产业帮扶模式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的产业帮扶模式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地分离”导致的撂荒现象^④。

表3 “人地分离”背景下不同产业帮扶模式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

Table 3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industrial assistance modes on farmers' cropland abando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eparation of farmers and cropland"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是否撂荒	撂荒面积	撂荒比例	是否撂荒	撂荒面积	撂荒比例
搬迁距离	0.010 [*] (0.005)	0.170*** (0.047)	0.013*** (0.004)	0.009 [*] (0.005)	0.154*** (0.048)	0.012*** (0.004)
产业帮扶	-0.047 (0.035)	-0.028 (0.311)	-0.043 [*] (0.024)	— —	— —	— —
搬迁距离×产业帮扶	-0.025*** (0.009)	-0.398*** (0.085)	-0.019*** (0.007)	— —	— —	— —
产业帮扶模式1	— —	— —	— —	0.018 (0.078)	1.041 (0.699)	0.008 (0.054)
产业帮扶模式2	— —	— —	— —	-0.031 (0.058)	0.234 (0.522)	-0.026 (0.040)
产业帮扶模式3	— —	— —	— —	-0.057 (0.045)	-0.350 (0.407)	-0.060 [*] (0.031)
搬迁距离×产业帮扶模式1	— —	— —	— —	-0.072 [*] (0.042)	-0.891** (0.380)	-0.053 [*] (0.029)
搬迁距离×产业帮扶模式2	— —	— —	— —	-0.061 (0.042)	-0.656 [*] (0.382)	-0.050 [*] (0.029)
搬迁距离×产业帮扶模式3	— —	— —	— —	-0.018 [*] (0.011)	-0.297*** (0.095)	-0.012 (0.0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223 [*] (0.124)	0.149 (1.114)	0.033 (0.086)	0.078 (0.120)	-0.112 (1.082)	-0.019 (0.083)
观测值数量/户	846	846	846	846	846	846
R ²	0.151	0.199	0.200	0.153	0.196	0.199

④ 考虑到农户参与哪种产业帮扶模式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可以观测到的影响农户可能选择不同产业帮扶模式的协变量进行匹配，使用匹配后的样本对平均处理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

3 “资源重组”目标下迁出村产业帮扶模式与实践应用

本文从产业帮扶的视角出发,探究提高迁出村耕地利用效率的实践路径。首先,廓清了研究对象是耕地具有生产潜力、可被利用的迁出村,这为后文探讨迁出村能否与如何发展产业提供了先决条件。其次,在实证分析部分,利用2021年8个中西部省区的846户易地扶贫搬迁户调研数据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后“人地分离”问题加剧了农户的耕地撂荒行为,而农户参与产业帮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耕地低效利用,同时还能够减弱“人地分离”对撂荒行为的影响。最后,为深入剖析各类产业帮扶模式的运行机制,在梳理2021年产业帮扶的一手调研案例基础上,于2023年1月进行了电话回访,归纳了易地扶贫搬迁后不同地区人—地—业“资源重组”的产业帮扶模式和实践经验。

3.1 产业帮扶模式1:搬迁户自行种植

3.1.1 产业帮扶模式分析

在运行机制方面,“搬迁户自行种植”产业帮扶模式指地方政府为搬迁户提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种苗、饲料、技术、销售渠道等外在资源支持,并通过技术培训培育搬迁户的内在发展动力,搬迁户对迁出村耕地产前、产中、产后进行完全自主决策。该产业帮扶模式中劳动力要素仍为搬迁户,政府一方面将外部生产要素直接导入至搬迁户的农业生产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培训提高搬迁户的技能,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资源重组”。

在优劣势分析方面,因为“人地分离”程度不大,“搬迁户自行种植”产业帮扶模式的优势在于搬迁户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易地扶贫搬迁前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无需花费土地整合成本,该模式下产业发展的投入成本相对较低。其劣势在于“资源重组”的程度不高,仍存在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的诸多问题。例如:其一,搬迁户抵御市场风险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整体不强,且未能拓宽就业渠道,返贫风险依然存在。其二,由于迁出村耕地的细碎化与农户决策的分散性,虽然部分耕地被用于种植政府所发的种苗,但尚未进行区域统筹规划与农产品品牌建设,产业发展难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其三,部分地区盲目追求某种产品的县域规模化生产而忽视地方自然资源条件的适用性,导致产业低效、重复发展。

3.1.2 实践应用案例分析

调查发现,对于距离耕地较近、处于社区融入、生计转型过渡阶段的搬迁户,政府后续产业帮扶政策为一些有能力生产特色农产品的小农提供了切实帮助,发挥了耕地的保障作用。但与此同时,还应关注到部分地区由于盲目推行产业,加之搬迁户能力有限,产业项目的实践效果低于预期目标、甚至破坏小农户原有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例如,在湖北省J县规划建设万亩核桃林案例中,一方面,地方政府未结合各村自然条件提供适宜种植的品种开展帮扶计划,要求各村均种植核桃树,但由于核桃树只能在50 cm以上的土层种植,并非适合所有迁出村;另一方面,部分农户生产决策经验不足,盲目增加栽植密度、担心施肥只长树不长果而不敢施加肥料,导致搬迁户的增收效果十分有限。再如,湖北省Y县搬迁户虽然在上级政府惠农政策扶持下,改种猕猴桃等经济

作物,但由于当地猕猴桃品牌效应不足,农产品只能低价出售甚至滞销。鉴于此,为实现搬迁户福利保障、迁出村耕地利用和产业发展的多重目标,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提供种苗等生产要素,并加强产后的加工及深加工、冷链物流与农产品品牌建设等环节建设。

3.2 产业帮扶模式2: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

3.2.1 产业帮扶模式分析

“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产业帮扶模式指搬迁户自行种植、直接参与产业发展,同时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并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辅助服务。该模式中,新型经营主体不仅为搬迁户统一提供种苗、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降低搬迁户的生产成本,还为其提供针对性的技术培训以提高搬迁户的生产效率,促进迁出村耕地的合理利用。在该产业帮扶模式中,新型经营主体作为高质量劳动力要素参与迁出村产业的发展,在投入环节中规划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利用,优化要素配置;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提供指导服务,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在产后提供辅助服务促进销售收入的提高。同时,通过培训提高了搬迁户的人力资本和耕地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资源重组”。

在优劣势分析方面,“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产业帮扶模式的优势在于降低搬迁户生产成本、针对性地给予搬迁户技术指导、稳定农产品销路,减少搬迁户与大市场衔接的不确定风险。此外,新型经营主体深入参与产前、产中、产后等多个环节,保障农户的生产质量,打造高质量农产品品牌,使得搬迁户获得专业化指导和品牌溢价。与“搬迁户自行种植”产业帮扶模式相比,该模式能更好结合区域优势,把握市场需求,打造高质量农产品品牌。其劣势在于:其一,该模式仍以小农户自行种植为主,产业融合水平较低,未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其二,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如订单农业等收购形式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企业便不再履约收购,造成农户损失^[18]。

3.2.2 实践应用案例分析

桑蚕产业是四川省X县的传统产业。调研地M村位于X县南部,“十三五”期间村内搬迁户有37户76人,占全村人口的34.1%,主要迁出到附近3 km以内的村庄。M村作为迁出村,在县、镇两级政府的指导与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依托X县桑蚕养殖产业链,结合本村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建立蚕桑专业合作社,采用“合作社+搬迁户”的模式,带动搬迁户进行产业发展。该合作社通过政策性资金收益、资源投入收益、投工投劳收益强化了利益联结机制,使蚕桑产业配套设施效益得以提高,并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一条龙”服务。调查发现,在产前,合作社整合帮扶单位帮扶资金和政府投资资金共计150万元,投资建设小蚕消毒室、共育室等配套设施;雇佣素质较高的搬迁户在村统一集中培育产卵,免费为包括搬迁户在内的所有养蚕户提供蚕种。待小蚕10日龄后,根据搬迁户意愿养殖数量将小蚕发放到户养殖。在产中环节,搬迁户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在迁出村耕地上种植桑树。合作社从县蚕业局聘请专业人员定期到搬迁户家中指导桑树种植和日常管理、蚕养殖与茧收储等技术。在蚕茧成熟后,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并利用先进的蚕茧烘烤工艺将生茧制成熟茧,提升蚕茧品质。

综上所述,M村突破易地扶贫搬迁前产业发展瓶颈的两大契机在于:第一,易地扶贫搬迁合法合规腾挪出部分用地用于合作社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实现了迁出村的“资源

重组”；第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及其后续扶持政策关注于产业发展问题，对迁出村进行了资金注入，提高了生产积极性。通过2年的努力，M村合作社利用该村撂荒土地等闲置资源，带动分散的搬迁户发展蚕桑和果桑200余亩，进一步夯实了产业发展基础。2021年两季共养“黄金茧”300张，卖出鲜茧1.2万kg，农民增收48万元。除了直接养蚕获得收益，搬迁户也作为雇工参与蚕具消毒、小蚕共育、蚕茧收烘、桑树管理等用工环节，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务工达174人次，实现集体经济收入1.8万元。总的来说，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为已迁出的搬迁户和村内的脱贫户提供了较为稳定、可持续的生计来源，拓宽了搬迁户收入渠道，提高了迁出村产业发展水平。

3.3 产业帮扶模式3: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

3.3.1 产业帮扶模式分析

在运行机制方面，“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产业帮扶模式指搬迁户将耕地集中到新型经营主体，由新型经营主体决定资源怎么整合利用、发展什么产业、如何发展产业。这种模式运行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土地整合。调查发现，新型经营主体以村集体为中介，在党组织的引领下通过委托帮扶、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方式对搬迁户的耕地进行权属上的整合，随后通过土地整治、“大田并小田”等方式从空间属性上整合零散的小块土地，形成规模化经营；在产业选择方面，在上级政府的带动下，新型经营主体往往结合迁出村的资源优势，进行特色农产品专业化种植，或将农业嵌入旅游业等其他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该模式下，政府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政策优惠，例如税收减免或者提供吸纳脱贫户就业补贴等经济激励，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整合、土地流转和土地集约利用等措施实现规模经营，直接提高土地要素的利用效率，并作为主要劳动力要素直接带动产业发展。

在优劣势分析方面，“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产业帮扶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是新型经营主体通过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流转土地、统一管理运营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效解决易地扶贫搬迁“人地分离”后迁出村耕地“怎么办”的问题，同时有助于发挥耕地的多功能性。二是产业的选择更加市场化，有助于真正依托地方优势资源培育出适合于脱贫地区发展的特色产业，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发展走品牌化之路，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还为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契机。三是搬迁户不仅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收益分红等方式获得财产性收入，还可以以产业工人的身份获得工资性收入，拓宽并稳定搬迁户收入来源。其劣势在于：一是农户可能有继续自行种植的意愿，为实现耕地规模化，产业发展前期需要与搬迁户、非搬迁户进行协商统一流转或入股，谈判成本较高。二是前期资金投入成本高，对主体的资金实力有要求。一方面，为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土地整治成本高；另一方面，旅游业发展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成本高。如陕西省X村WS公司在前期投资2亿元修建道路来发展富硒茶叶，四川省X县花费40亿元修建道路来提升景区交通水平。

3.3.2 实践应用案例分析

贵州省L市S区Y乡属于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较为集中的乡镇，搬迁人数达2700余人，占总人口的12%，搬迁户安置区与迁出村距离25.09 km，加之山地交通不便，“人地分离”问题更加突出。面对如何利用好迁出村耕地、有效实现“资源重组”的问题，Y乡

政府通过调查发现，当地特色农产品“刺梨”可生长在土地贫瘠的地方（甚至石旮旯中），生命力旺盛且经济价值较高，适合作为当地重点产业进行开发。进一步，结合区域统筹规划，Y乡政府采取了党建引领下“公司+合作社+农户（搬迁户）”的发展模式，由企业负责全区刺梨鲜果收购、加工、销售等事宜，实现迁出村和其他村庄的区域统筹、产业融通，共同打造S区刺梨品牌。

Y乡通过“三变改革”有效破解了搬迁后“人地分离”导致的耕地低效利用困境，推动了迁出村人一地一业“资源重组”。在此过程中，企业以3元/斤的保底收购价对刺梨种植农户的鲜果进行收购，按照每亩2000斤算，一亩地的刺梨卖出去就能拿到6000块钱，有效助力当地群众增收。同时，搬迁户、合作社与公司按搬迁户占60%，合作社占30%，公司占10%的利益联结机制对产业发展收益进行分红，保障刺梨“有种植、有产出、能销售、稳收入”。据访谈资料显示，Y乡充分盘活搬迁户耕地，截至2022年已实现刺梨种植面积2.03万亩、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刺梨“千斤园”1501亩的规模化经营；2022年度采摘刺梨鲜果1033.42 t，带来收入620.05万元。Y乡Z村搬迁户L在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下，通过种植刺梨6.5亩入股，2019年纯收入达8169元、2020年16686元、2021年18162元、2022年18219元。此外，L市S区为全力盘活搬迁群众迁出村的耕地，将搬迁群众耕地盘活纳入全区农业现代化整体布局，实现了产业统筹发展。

3.4 不同产业帮扶模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归纳了易地扶贫搬迁后迁出村的三种产业帮扶模式，这三种模式均有一定的适用条件。据8省（自治区）调研数据统计，在参与种植业产业帮扶项目的农户中，12.5%属于“搬迁户自行种植”产业帮扶模式（模式1），87.5%属于“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或“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两种产业帮扶模式（模式2、模式3）。基于前文分析，“搬迁户自行种植”的产业帮扶模式（模式1）对农户参与种植的经验、能力有较高的要求，适用于搬迁距离近、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且有特色农产品生产经验的地区，在这种产业帮扶政策支持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种植收益。“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的产业帮扶模式（模式2）对当地政府引入或培育合作社、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能力要求较高，适合一些搬迁距离较近且有合作社、能人等带动基础、村庄集体行动能力较高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搬迁户对土地种植的意愿与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益。“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的产业帮扶模式（模式3）取决于农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以及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程度，前期投入成本较高，对地区是否能够引入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合作社、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有着极高要求，因此适用于农户搬迁距离远、对农地的依赖较弱且有合作社能人带动的地区，能够破解“人地分离”造成的耕地低效利用困境，实现区域“统筹规划”与“资源重组”，促进迁出村所在区域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总的来说，“搬迁户自行种植”与“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的两种产业帮扶模式，均是搬迁户直接参与生产，但区别在于有无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而“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与“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的两种产业帮扶模式，均是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区别在于有无土地整合并进行规模经营（图3）。在具体实践中，地方政府既要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帮扶模式，又要推动产业帮扶模式的转型升级，从而发挥耕地多种功能、加速产业融合发展、拓展搬迁户收入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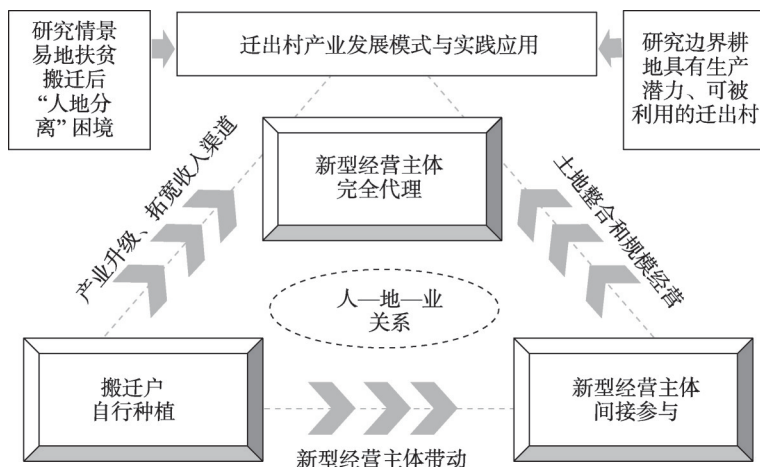


图3 三种不同产业帮扶模式间的相互联系

Fig. 3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ree different industrial support modes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人—地—业关系的理论框架出发,本文得出主要结论如下:一是在理论层面,易地扶贫搬迁重塑了迁出村人—地—业的耦合关系,产业发展作为连接“人”和“地”的重要环节,有助于缓解易地扶贫搬迁导致的“人地分离”问题,从而实现“资源重组”。二是实证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面临的“人地分离”问题加剧了耕地撂荒行为,参与产业帮扶能显著减少耕地撂荒行为。产业帮扶能缓解耕地距离对撂荒行为的影响,且不同产业帮扶模式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三是结合理论框架和案例资料,根据“人地分离”程度与“资源重组”程度两个维度,将产业帮扶模式分为“搬迁户自行种植”“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与“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三种类型。对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给予针对性的后续产业帮扶措施。

4.1 开辟多元化土地整合方式,重视易地扶贫搬迁后迁出村的资源盘活

基于人—地—业关系理论框架中“地”的视角,地方政府要注重结合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特点,通过规模化生产、退耕还林等机制因地制宜盘活迁出村的耕地。对此,一是,对于自然条件恶劣、质量差且细碎的耕地,应该纳入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改善生态环境。二是,切实开展盘活闲置土地工作,对闲置土地详细调查,系统掌握可使用的闲置土地的分布、数量及性质,建立闲置土地资源信息库。三是,重视资源盘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能动性,大力支持公司、能人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土地托管以及“小田并大田”等土地整合形式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发展特色种养殖业,盘活搬迁群众的耕地。

4.2 重视经营主体在产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提高联农带农能力

基于人—地—业关系理论框架中“人”的视角,迁出村产业发展要考虑“人地分离”的特殊背景,完善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引入新型经营主体,既能解决“人地分离”背景下的土地资源低效利用问题,又能带动搬迁户参与产业活动实现增收。对此,应积极培育并引入新型经营主体嵌入迁出村产业发展,一方

面,推广股份合作、订单帮扶、生产托管等方式,推动搬迁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建立稳定、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另一方面,鼓励搬迁户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形式与公司、能人大户、合作社合作,增加搬迁户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发挥党建引领促进搬迁户形成集体共识,降低新型经营主体的谈判成本,缓解新型经营主体与搬迁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4.3 发挥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作用,因地制宜进行产业选择

基于人一地一业关系理论框架中“业”的视角,迁出村的产业选择要发挥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产业选择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避免盲目规划、重复建设。一是,根据各地资源禀赋与传统优势产业特色,进一步考虑迁出村应如何利用耕地发展产业,例如是直接发展第一产业,种植土地密集型的粮食作物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作物,抑或是将耕地嵌入旅游业等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防止产业项目的低水平重复。二是,积极探索“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决策相结合的乡村产业选择模式,发挥党组织的沟通作用,促进政府在了解农户对村庄产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根据区域比较优势规划乡村产业发展方向,充分研究和分析各种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利弊,最终选择适宜的产业模式。三是,针对不同产业帮扶模式提供政策支持,例如“搬迁户自行种植”模式,在产前环节注重生产要素提供的同时,更要注重提供产后的深加工、冷链物流与农产品品牌建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对于“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与“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模式则应积极培育具有专业经营能力的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提供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支持来提高其参与意愿,提供金融支持来缓解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约束,注重完善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王君涵,李文,冷淦潇,等.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10):143-153.[WANG J H, LI W, LENG G X, et al.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of poor households: Analysis based on three waves of microdata from 16 counties in 8 province.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0(10): 143-153.]
- [2] 龙彦亦,刘小珉.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生计空间”视角解读.求索,2019,(1):114-121.[LONG Y Y, LIU X M.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space"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policy. Seeker, 2019, (1): 114-121.]
- [3] 涂圣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中国农村经济,2020,(8):2-12.[TU S W.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Goal orientation, key areas and measures.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 (8): 2-12.]
- [4] 刘明月,汪三贵.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的有机衔接:逻辑关系、面临困境及实现路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7(4):137-144.[LIU M Y, WANG S G. The linkage between poverty-alleviation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prosperity: Logical relationship, difficulties and way-out.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57(4): 137-144.]
- [5] 岳国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构建.经济问题,2020,(8):107-113.[YUE G F. The connec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juvenation. On Economic Problems, 2020, (8): 107-113.]
- [6] 林万龙,华中昱,徐娜.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实践困境与解决对策:基于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区若干贫困县的调研总结.经济纵横,2018,(7):102-108.[LIN W L, HUA Z Y, XU N. Main modes, practice dilemmas and solutions

-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from field survey in several poverty counties of Henan, Hunan, Hubei and Guangxi.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18, (7): 102-108.]
- [7] 刘红岩. 中国产业扶贫的减贫逻辑和实践路径.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6(1): 156-167, 205. [LIU H Y. The poverty reduction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36(1): 156-167, 205.]
- [8] 刘明月, 冯晓龙, 冷淦潇, 等. 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 制约因素与模式选择.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10): 51-63. [LIU M Y, FENG X L, LENG G X, et al. Factors and mode selection from poverty-alleviation-based industry development to thriving business: Constraint.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1, (10): 51-63.]
- [9] 谢大伟, 苏颖, 赵亮, 等. 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模式与效果评价: 来自新疆南疆三地州产业扶贫的实践.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1): 8-13. [XIE D W, SU Y, ZHAO L, et 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s and effects evaluation for severely impoverished areas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Case of three prefectures of Southern Xinjiang.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5(1): 8-13.]
- [10] 周国华, 龙花楼. 探索新时代人一地一业协调与城乡和谐的中国乡村发展: 写在专辑刊发之后的话.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8): 2184-2186. [ZHOU G H, LONG H L. Exploring the human-land-industry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8): 2184-2186.]
- [11] ZHANG Y, LI X, SONG W, et al. Land abandonment under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explained from a cost-benefi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 524-532.
- [12] 周扬, 李寻欢. 贫困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与学科前沿. 地理学报, 2021, 76(10): 2407-2424. [ZHOU Y, LI X H. Basic theories and frontiers of poverty geograph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10): 2407-2424.]
- [13] 丁建军, 冷志明. 区域贫困的地理学分析. 地理学报, 2018, 73(2): 232-247. [DING J M, LENG Z M. Regional poverty analysis in a view of geography scie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2): 232-247.]
- [14] LONG H, ZHANG Y, TU S. Rural vitalization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land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9, 29(4): 517-530.
- [15] 朱从谋, 王珂, 张晶, 等. 国土空间治理内涵及实现路径: 基于“要素—结构—功能—价值”视角.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2): 10-18. [ZHU C M, WANG K, ZHANG J, et al. The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territorial spac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s-structure-function-value". *China Land Science*, 2022, 36(2): 10-18.]
- [16] 孙晶晶, 黎洁.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非农就业与耕地撂荒: 就业区域还是就业质量重要?.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0): 2536-2553. [SUN J J, LI J.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farmland abandonment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mployment area or employment quality more important?.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0): 2536-2553.]
- [17] 武汉大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课题组. 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特征与后续扶持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12): 88-102. [Wuhan University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Follow-up Support Research Group.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ath selections of the follow-up support.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 (12): 88-102.]
- [18] 王春光, 单丽卿. 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小农境地”与国家困局: 基于西部某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35(3): 38-47. [WANG C G, SHAN L Q. Peasant condition and dilemma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n a case of a poor village in Western China.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8, 35(3): 38-47.]

"Separation of farmers and cropland" and "resources reorganization": Research on cropland abandonment and industrial assistance modes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LEI Xin-yuan¹, ZHANG Yi-tong¹, QIU Huan-guang¹, YANG Xiao-ting²

(1.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industries is the key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ropland abandonment caused by "separation of farmers and cropland" and to promote the "resource reorgan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land, and industry in the out-migration village. However, there is limited research on the utilization of cropland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sues related to out-migration villages. Firstly, this paper clarifies that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e out-migration village with production functions. Furthermore,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 framework of farmer- land- industry relations is constructed, and three industrial assistance modes are summarized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degree of separa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cropland and the degree of resource restructuring, including self-cultivation by relocated households, indirect participation by new business entities, and complete agency by new business entities. Secondly, based on the data of 846 relocated households in eight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this paper uses OLS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relocation distance on cropland abandonment behavior, and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assistance mod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paration of farmers and cropland" problem exacerbated by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has intensified cropland abandonment behavior. And participating in industrial assistanc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ropland abandonment behavior, and also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land distance on cropland abandonment behavior, and all types of industrial assistance modes can play a certain role. Fi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revitalizing out-migration village resources, promoting new business entities, and choosing industrial assistance modes.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separation of farmers and cropland"; "resources reorganization"; industrial assistance; cropland abandonment